

第一章

具轉化力量的神學

Transforming Theology

為甚麼要做神學？

今天大部分西方人士似乎都覺得教會與現實脫節。教會並沒有碰觸他們日常的生活，也沒有觸及他們關注的事情、他們的習慣常規或他們的掙扎。可是，當被問及他們是否相信上帝，不少人卻會說他們相信，其中更有不少會進一步見證，談及在其個人生命中經歷到上帝的臨近。部分人覺得基督教信仰特別提供了意義和價值方面的應許，而這正是他們所渴望，也是在他們自身的經驗中曾瞥見的。但當被問到對教會的觀感，卻是另一回事。教會告示板上的標語「基督就是答案」常叫我咋舌。我懷疑許多人都會這樣回應：「我同意！可是究竟教會是否知道問題是甚麼呢？」

基督教是一個具轉化力量而又活潑的信仰，它握有那條通向我們心坎最深刻關注的鑰匙，然而我們總是很難找到一個滿意的方法結合我們的基督教信仰與日常的生活；相反，我們卻聽到這奇妙的基督教信仰被教條化的論調、複雜的神學專有名詞和牽強的解釋所窒息。我們得承認，我們作為教會，真的沒有恰如其分的將基督教信仰呈現出來。當然，教會在其全盛時期也曾嘗試回應世界，本地以至世界各地上下各階層基督徒也在前線作工，他們為受苦者包紮傷口，介入擔起每天的掙扎，並奉上發自心底的敬拜；雖然基督徒這份忠信大都不為公眾所看見，但我相信它見證了一件事，就是在一般基督徒的生命中，信仰與生活是時時刻刻連結在一起的。不過，我認為，假如基督徒有更好的工具去理解信仰，能更清楚看到信仰的確與他們的喜樂和掙扎息息相關，這種對基督教信仰的適切性和活力的見證便強大得多。這樣，教會外的人便能夠看見教會內基督徒的生活，並感受到他們與自己相通之處，見證着一種的確與他們在個人生命中所經歷的上帝互相呼應的信仰。

我一直深信，神學可予改革，使它能夠在這事上成為一個很有效用的工具。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情，早在一九八九年寫成本書的初版，因為當時我曾參與多個基督徒小羣體，他們各別已找到做神學的方法，把生活的關鍵經驗跟基督教信仰的永恆真理連結在一起。問題是當時許多被視為神學的東西，不過是學生於神學院內埋首翻閱枯燥乏味的篇章，並被告誡要遠離「外面」的世界。因此，要改革神學頗是一項雄心壯志的創舉，特別是連「神學」一詞本身，也被那些在世界

的事和決策中打滾的人用來作為堵塞對方的辯詞：「你的論點正走進幻想的領域。」他們會這樣向對手說：「你不過是在談論神學啊！」¹

但我卻親眼目睹神學在一羣一羣平凡的基督徒手中重現活力，讓神學證明自己具有驚人的潛質，足以重新創建一種整全的基督徒生活。它把信仰重新「接觸」生活。即使在那個時代，世界各處已泛起了波濤，顯示神學的力量足以翻天覆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一些地區，都綻放着一種對神學的新興趣，而它賦予參與者的力量促使他們整個生命得到轉化，而這發現更令他們感到得釋放。

自本書初版成書以來，學術界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曾幾何時，學生進入院校或大學是「讀」神學而不是「動手做」神學。他們期望導師會告訴他們怎樣從圖書館的芸芸偉大巨著中找到世界偉大哲學問題的答案。他們要消化書本所列舉的論點，並學會它們的內容，好讓日後走進世界時，能夠把這些答案應用到所遇到的任何問題上面。保羅·弗萊雷 (Paulo Freire) 把這種學習方式稱為「教育的儲蓄理論」(banking theory of education)，²就是在接受正規神學教育時把多筆儲蓄存進你的智慧戶口，以便在生活情境中把它們提取出來。這個做法假設在院校裏有一個「純」神學的儲存庫，而它可以「被應用」於任何境況，縱使人生錯綜複雜的問題層出不窮。無怪乎有人指稱，神學是毫不關切的幻想。

不過，這種「儲蓄」式的教育也開始令許多學術界人士感到失望，以致他們也要尋覓新的方法，讓神學的寶藏可於基督徒的生命中服事他人。同時，不論男女的基督徒也過着活躍和具創意的生活、經

營教會、投入社區計畫以及試圖影響社會，只是這些活動往往未經過深入的基督教神學反思。他們部分人會覺得缺乏顯著的確據，以證明他們的活動是完全符合其信仰和信念。另一方面，較為保守的基督徒則認為，就他們的活動進行任何神學評鑑都與「憑信心生活」相違背，因而決定繼續進行而不多加思考。而另外一些人就是覺得老式的書卷味神學令人卻步。不論在任何社會，覺得閱讀是苦差者大不乏人，而另一羣人則有能力閱讀但不肯拿起書本來。神學既然背着書本這沉重的包袱，它又可以怎樣適切這些人呢？

因此，本書的目的，是倡議一個大膽創新的做神學方法，讓神學傳統要教導我們的精粹，可以完完全全地結連於日常生活，並跟我們社會的各項議題結連。我盼望這樣可以為「活動家型」跟「學術型」這兩個陣營的神學找到一個共同的使命，並在尋求改變人和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的路上互補長短。這當然需要對我們所認為的「神學為何物」作出重大的重塑，也需要現正從事學術神學以及把這整個神學事業視為不必要的人士都明白到，神學是一個遠超過他們所想像的廣闊活動——而每一個人當中也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

參與神學

當我們尋索一種把各式人等都包羅在內的神學，這可大大豐富其內涵。這意味着書本不再是屬靈智慧的唯一載體，而舉凡是故事、

電影、流行音樂、靈歌、詩歌、手工藝、電腦遊戲、服裝、舞蹈，皆可承載人深層的屬靈經驗的表述，而這些表述所代表的文化都不甚熱衷於教室或教堂。如果這種種豐富的表述方式被應用於神學範疇，神學便可以從文字的藩籬中掙脫出來，進而使用文化和身體語言的自由渠道去表達它要着眼的智慧。畢竟，教會歷代以來其實都明白到，信仰的偉大真理如果只限於學術式的命題，便會大受約束和窒礙。這解釋了教會為何有聖禮、藝術、音樂、建築、社區計畫、宣教服務、敬拜、關懷、團契等等。當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教導他的追隨者傳福音的藝術，便言簡意賅地說明了這道理：「把福音傳給你所遇到的所有人，但只在必要時才用上字句。」

我們採納一種更實際又讓人多加參與的做神學方法，理由不單因為它具有較大的教育效用（雖然情況的確如此），或單單因為它有助個人在信仰上的成長（雖然它能夠做到這一點），而是因為它會正視今天的議題，並讓上帝的國引導我們前進，好使我們有分參與改變社會的工程。它會邀請上帝的所有兒女成為自己歷史的主人，為自己的命運當家作主，而不甘淪為不敬虔勢力的一隻棋子。基督教絕不可哄騙人去相信虛假的宿命主義。相反，它應該成為一個動力，推動我們積極投身於地上的公義與和平，「如同在天上一樣」。

這種革新的神學既屬於每個信徒，它就要求神學家切切實實地投入世界，但求上帝改變這個世界，也改變身處世界的自己。我們可以把這種積極的神學工作簡稱為「知行合一」（praxis）。這個專有名詞有時會被誤解為只是「實行」（practice），但它的意義包含更廣。它包

括了一種必然牽涉到行動的反思，以及一種需要反思的行動。「知行合一」是行動與反思，委身與靈修的交織。它提醒我們，任何沒有反思的行動都會變得不負責任，而沒有行動的反思則是一潭死水。正如雅各書所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雅二20, 22），這正是「知行合一」之意。

讓我們一起做神學！

芬德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基督徒。她遇上一個難題：她任職一間店鋪，辦公室就在店鋪後面，僱用她的連鎖店老闆剛通知她要裁減一名下屬，否則店鋪便要關門。她跟下屬關係良好，也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故事，但她得到一個指示，是要把其中一人辭退。她決定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翻查關於勞工、裁員等事宜的法例，然後向她的老闆和同事細心查明有關事實。她是個委身的基督徒，所以可能很快便為這事祈禱，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例如，她還可與當地的基督徒一同反思，從而得到幫助，這可能是一個查經小組（如果有的話）。也許，當她在下一個主日早上參加崇拜，所唱的一首聖詩可幫助她從更合宜的角度去看她的選擇。找她的堂區牧師商談也幫得上忙，她也許會從一本基督教刊物看到一篇文章，當中討論到基督徒在現今世界要作的抉擇。凡此種種，都有助她以不同的方法就如何應付工作情況而作出決定，然後跟店鋪的同事商量，最後一同擬訂和執行了一個策略。

樣經常的聯繫，便可更肯定她的思想和行事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她能夠完成這複雜的任務，讓自己的行動與基督徒的理解和基督徒羣體適當地結合在一起，我們便可以以下判斷說，連她最終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屬於「神學」。

不過，我們也要慎防把神學的定義定得太廣，使它失卻意義。我們很容易墮入這個誘惑，因為要理解神學的意義，從實際動手做較諸試圖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來得合適。神學與其說是一項我們要描述出來的東西，不如說是一種需要我們去經驗的生活方式。因此，我會在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中描述我們可以怎樣以令人興奮和具創意的方式做神學。我期望當讀者跟我一起遊歷以下書頁的旅程時，「神學」這個令人費煞思量的字眼的真正意義會愈來愈清晰和明確。

在我描述實際上可怎樣「做」這種神學以前，讓我先稍稍分享一下自己的處境，以便大家看到我所倡議的「做神學」方法的緣起。

活在令人興奮的時代

1. 救恩與上帝的國度

我生於二次大戰結束的年代，住在倫敦東面的貧民區，父母親分別是公共汽車司機和工廠工人。我以自己的工人階級傳承引以為榮，

在成為基督徒以前受着家中的社會主義信念薰陶。對於耶穌所教的禱文，我特別喜歡願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一節。我在一九六八年移居紐約市。我就在這青春歲月，適逢為美籍黑人爭取自由的民權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時的婦女也開始重新思考她們的社會身分，部分人更問：究竟這種自我的新意識對上帝的性情有何啟示。他們讓我看到，個人的經驗與身分是與社會對我們的影響息息相關的，而上帝對這一切至為關注。這些對社會的看法跟我從英國帶來的經驗互相呼應，我開始在新結識的同儕身上學到，上帝所賦予人的自由不但是賦予個人，它同時以更強烈的方式適用於結構性和社會性的層次——在天國的層次。非洲一句諺語說：「人之為人，是建基於他跟別人的關係。」這話提醒我們要與社會扯上關係才可以成為完整的人。我們彼此的關係唇齒相依，因此除非我的弟兄姊妹也得到自由，否則我的自由和得贖還未算真正完全。聖保羅承認：「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後十一29）

所有這一切於我而言，意味着神學的焦點必須在個人、羣體和結構的層面注視人類自由和成全的課題，好讓人能夠在他們所身處的情境中成為主動的主體（active subjects），而不會淪為生命遊戲中的一隻棋子；因為假如社會結構可以釋放人，使他們可以生活在友愛的團契中，同樣的結構也有能力捆綁整個羣體（參西二15）。上帝既給予個人以至社會這種把人釋放的自由，這應許也應該必然地把一股有力和喜樂的元素注入我們的神學探索中。如果我們把神學做得好，值得慶祝的事多的是。

2. 神學包含着行動

當我在一九六三年離開學校，有幸受聘在伯明翰精神病醫院擔任約翰·樂京醫生 (Dr John Locking) 的助手。樂京醫生當時正研究如何幫助有嚴重學習困難的人士。他採用瑞士認知學 (epistemology) 哲學家皮亞傑 (Jean Piaget) ⁴ 的理論，試圖把這些理論化為實際的學習系統，對象是成人病人。樂京醫生先進行實驗，然後我們就有關實驗進行反思，以便進行下一個實驗，直至最後得出有效的方法。這過程是行動與反思，做事與思考——在尋求精益求精的過程中，兩者是持續不斷地交織在一起。今天，這種「行動—反思」模式——即先前所謂的「知行合一」——已應用於各大行業中，可是在教牧人員以至廣大教會中尚未成為一個內定模式 (default mode)。社會工作者、醫療人員、律師、教師都各有他們的師徒制度和小組，藉對經驗的反思而改良其行業。同樣，優秀的神學工作也當運用這個「行動—反思」的學習模式。⁵

耶穌清楚表明信念是重要的，但祂告訴我們最終要以人的行為去作判斷——「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七16, 20) 理論確有其吸引力，但它的危險是誘使我們忘記它所發自的實質世界。然而，當理論幫助我們從所處的境況中退後一步，以較客觀的態度看事物，它是饒具效益的，容讓理論指導我們行事，好使行動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根據。假如行動以這樣的方式成為神學一部分，我們對神學的判斷便不會單憑它的學術，而且還視乎它如何引發忠於信仰的生活。⁶如果我們要創建一個紮實的神學過程，它必須是理論與實踐並重——我們「做神學」，而不是單單進行「神學反思」。

3. 權力的問題

在美國待了一段日子後，我再回到伯明翰工作，遇上大學的首席教牧學講師卜·林寶（Bob Lambourne）。他給我介紹埃頓·博伊申（Anton Boisen）的工作。博伊申在一九二零年代曾是一所精神病醫院的病人，他發覺診治他的醫生都認為，他對自己疾病的見解沒有甚麼參考價值。作為「病人」，他在人們的預期中被視為被動的，但他卻滿懷熱情的確信，他在治療關係中也有主動的角色。他因此在餘生致力構思讓專業人員與其受助人彼此分享權力的辦法。⁷

博伊申所探討的權力問題，比較屬於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層次，而另一方面一位替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工作的廣告代理則在一九七零年代首創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使全世界突然意識到一種新的權力動力在影響整個地球。我們都知道，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有時會把他們祖國的文化加諸土著文化身上，而從來都沒有停下來思索究竟當中牽涉到甚麼權力遊戲。不過，今天如便雅憫·巴貝（Benjamin Barber）等學者都在闡明，當某一個文化企圖以這樣的方式支配另一個文化，我們可預期最後只會帶來受制者的重重反抗。巴貝一篇題為〈聖戰與麥當勞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論文便扼要概述了他的理論。⁸在現今世界，列強——不論是國家或機構——都企圖把他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加諸整個世界，結果威脅到世界和平及地球的持續性。套用巴氏的說話，他們在企圖締造自己的「麥當勞世界」（McWorld）。但當各地方的文化和身分受到這樣的壓制，當地人民便會抗拒入侵者支配他們的權力，並會累積一種合理的反彈。因此，不

論在個人之間和文化之間的層次，同樣浮現了相同的問題——「我們當怎樣處理權力？」

上帝是全能的，可是祂倒不像我們，因為祂的權能只用於愛上面。因此我全心相信，在權力這個問題上摔跤（wrestle with，亦有「深思斟酌」之意思），其實是在上帝的性情這課題上的摔跤。⁹權力是一個屬靈的課題，因為它是跟愛與恨、善與惡等問題緊密相連的。可是，當耶穌在八福（太5:3-12）中提到沒有權力者特別蒙受上帝賜福，這叫我們對權力的理解啞口無言。

因此，這個關乎權力的耐人尋味屬靈問題，其性質和運作必須常常是神學的主要關注，因為在權力問題上面的摔跤就是與上帝的摔跤。我們總要問：在這個情況中，誰在掌權；以及在正發生的事上，誰得益最大。即使在實際做神學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留意權力的種種問題——它本身必須是羣體所共同擁有的事，它是屬於所有人，而不是任何精英羣組，不論是學術或教牧人員的專利。神學必須成為公眾領域的材料，它因此更容易受到損害。

4. 所有神學都有其處境

我的好友蒙耐·法拉（Mones Farah）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的基督徒。他邀請我到他位於拿撒勒的家小住，他父親埃頓（Anton）是一位備受尊崇的巴勒斯坦教師，有一天他帶我遊覽撒科列（Sepphoris）的古蹟，觀賞這個只需步行一小時便到耶穌的家的城市。當埃頓給我介紹

這城的街道、市集和宮殿，耶穌生活的世界立時清晰地活現眼前。近年考古學和歷史研究讓我們對耶穌生活和活動的處境有了不少認識，增進了我們對祂的生平和教訓的了解。¹⁰正因為耶穌的道成肉身是具體地發生在某一個地理和歷史的處境中，處境的研究有助了解祂給我們的啟示。這提醒我們，在祂以後的每個神學家也是扎根和身處於某一個地方、時間和文化當中，而認識這文化同樣有助我們認識這人的神學。

我有幸生活於一個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發現的年代。當克霍·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深具開創性的著作《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¹¹在一九七三年面世，我當時剛被按立為牧師。這作品帶頭喚起我們對他者的尊重，並提供了讓我們理解彼此間文化差異的工具。這種對處境重要性的體會¹²不但叫我們留意宣教工作容易陷入文化帝國主義的危機，而且更把一些基督徒釋放出來，讓他們開始從其自身的經驗和處境談論上帝，而這自由造就了黑人神學、¹³女性主義、解放和都市神學¹⁴以及類似運動的新發展，而這一切更改變了神學的面貌。

當基督道成肉身，祂是把自己置身於文化處境之中，與人一起體驗他們的經歷。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地擬訂一種道成肉身的的神學方法，這種神學容許我們仔細而具批判性地察閱每一個處境，以確保我們的神學不是來自抽象的假設，而是一種內容充實而適切相關的神學，它的聲音既來自也切合有血有肉的人，而他們都處身於某一個獨特的文化、地方和時間。

5. 上帝關注處於邊緣的人

與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教會共處的經驗，對我起了深遠的影響。西方人不能想像里約熱內盧或馬德拉斯／青耐（Madras／Chennai，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貧民窟的真實狀況。但當你看到居住在這些卑劣環境中上帝子民的友善和關懷，無不叫人謙卑下來。舊約聖經（王下七3-20）記載了一個故事，四個被拒於圍城的癡瘋病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定闖入侵略敵軍的營中碰碰運氣，因為他們已經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失去。結果他們給城中的人帶來好消息，原來敵方早已逃遁。這些被拒的癡瘋病人反而成為傳揚好消息的使者。

我在英國貧困地區擔任堂區牧師多年，親身經歷到那些貧困和處於邊緣的人給我敞開真理，而這是處於安逸和自給自足的人無法做得到的。我們似乎只能夠從社會中最被壓制和「勞苦擔重擔」¹⁵者的角度，才看到一個社會的真正面貌。因為那些在社會的殘酷現實中不受保護的窮人才能清楚看到這些真相，而那些備受保護、不知人間疾苦的人就是不能看到窮人所看到的。耶穌選擇與那些最受壓迫以及從底層看社會的人結伴。在綿羊和山羊的比喻中，祂直接說明自己是處身於那些飢渴、客旅、赤身露體、患病和在監裏的人當中（太二十五45）。

當我們建構做神學的最佳良方時，必須緊守上帝對困苦者的優先承擔。¹⁶但同時也要慎防一個重大的危機，正如郭佩蘭¹⁷所告誡的，一些好心的教會人士屢屢被窮人的困苦吸引，而特別是西方的神學家會在其思想和著作中「利用」這困苦，但卻沒有真正與這些窮人並肩同工，以期

改變導致其困苦的關係。我們的神學方法必須引領我們去與貧窮人共負一轡，而不只是以那折磨人的貧窮為我們的興趣焦點。

6. 勇敢的靈性

安德 (André) 和亞瑪 (Almir) 是操葡萄牙語的。安哥拉主教安德透過傳譯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我從聖保羅的著作知道，我們應該為在事奉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喜樂和感恩。因此，當我明年沒有錢支付薪金去推行事工和照顧我的孩子，我要做的就是找辦法去感謝上帝。」亞瑪聽到之後便懇切為他祈禱，他自己是一位來自巴西的宣教主教 (missionary bishop)，即將要回到亞馬遜內陸森林極為危險的宣教工場。我們不易為勇敢的靈性下定義，但當你處身其中，便能意會箇中真諦。

我們不要忘記，最優秀的神學不會只顧談論關於上帝的事，而是養成一種習慣，曉得我們常常身處上帝的臨在之中。使自己「臨在於上帝的臨在中」(present to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最早期初代神學的全部關注，因為你毋須祈禱也可以讀神學，但假如你沒有祈禱和靈修的習慣，你就絕不能成為一位神學家。本都的伊華紐斯 (Evagrius of Pontus，生於第六世紀的一位沙漠教父) 甚至把神學家定義為「一個有真摯祈禱的人」。因此，如果要成為神學家，我們必須正如聖保羅所說，分辨「基督的心」(林前二16，又參腓二5)，讓我們放下地位如糞土，留心聆聽他者心靈深處的經驗，在需要行動時拿起不屈不撓的勇氣付諸行動。敵擋着公義與和平的勢力相當巨大，我們需要聖靈加力(弗六10-20) 以及勇敢的靈性，方能一起作戰。

我們也要倚靠聖靈與我們同在，方能以豐富的想像把信仰與生活連在一起，而這正是做神學的精髓所在。舉例說，當我們在聖餐禮中瞻仰祭壇上的餅，聖靈使我們在這簡樸的餅中看到耶穌的臨在，而當我們帶着這樣經過操練的眼睛走進世界，便預備好在一切事物中看到上帝。缺乏了這種被聖靈充滿的專注，便不能夠做神學。因此，我們所發展的做神學方法，必須常常對聖靈的臨在持着開放的態度。

在這開首的篇章，我們思考過為何要致力使神學成為轉化自己生命以及我們所服事的世界的一種工具。我希望已給你描繪了我的一些經驗，在我發展一套有助達到這目標的「做神學」模式過程中，這些經驗都曾影響我。現在我要轉去描述這模式，看看它是怎樣運作的。

註

- 1 我是在一九八九年聽到備受尊崇和學識淵博的英國政治家戴尼斯·夏萊 (Dennis Healey) 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台訪問中說出這番話。
- 2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p. 46.
- 3 關於在困境中對上帝的體驗，見 Ford, David (1977), *The Shape of Living*. London: Fount。
- 4 例如見 Piaget, J. (1953),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認知學這門學科是研究我們如何認識事物。
- 5 見 Foskett, J. and Lyall, D. (1988), *Helping the Helpers: Supervision and Pastoral Care*. London: SPCK，也見於 Hawkins, P. and Shohet, R. (2002), *Supervision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An Individua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Buckingham, UK, Philadelphia, US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6 當我們留意教義與神學有多大程度是源自崇拜的經驗，便可看到行動與反思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在聖經中可找到許多關於神學來自禮儀的例子，例如在希伯來書和啟示錄。在希伯來經卷中，那些重大的節日也同樣產生了逾越節、出埃及等等的神學。